

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 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

王 宏 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面臨一種新的兩難：一方面要強調主權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必須對西方世界做出妥協。前者需要凸顯中國的利益，後者則要求中國做出犧牲，兩者同時並行的矛盾造成抉擇上的困境。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的新願景，並以「新型大國關係」為主軸。然而，「中國夢」所提出的「奮發有為」，是否將脫離原先胡錦濤「和諧世界」的外交政策，並能夠與美國相抗衡？本文試圖檢視大陸近年來的和平外交主張與內容，並探尋其中的轉變與新意。

關鍵詞：中國外交政策、和平、關係模式、單邊主義

* * *

壹、前 言

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之後，加速國內的各項改革與開放，促成經濟建設的快速成長與發展。但在對外關係上，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似乎在一種守舊與突破的思量之間來回擺盪，這使得任何一位中國大陸領導人在處理對外關係的時候，都必須還要同時面對（或者說照顧到）過去歷史上所建立起的各項原則與目標。^①例如，當代的領導人

* 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副教授在 2015 年南華大學所舉辦的「習近平主政兩周年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上，對此初稿的評論。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細心審閱，替本文提出相當多的指正與建議。唯本文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註① 所謂「守舊」與「突破」的考量，比較接近中國大陸內部的「繼承」與「發展」之用法。也就是，到底要繼續堅守前領導人所建立起的外交原則、語彙或價值觀，還是可以突破舊有的框架限制，表現出新的外交立場。吾人可以很清楚看到在目前各種中國大陸官方的文件中，不時發現這種在「守舊」／「繼承」與「突破」／「發展」之間思量之下的痕跡。例如，周恩來當年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馬克思主義觀點下的國際秩序與詞彙等等，到現在仍是或多或少重複使用著。但是，在不同的年代、

一方面要遵循毛澤東時期所訂立下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強調中國在西方世界之前的主權獨立與自主立場；另一方面，為了與國際接軌，又必須對全球或是西方標準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與配合。前者需要凸顯中國的利益，後者卻要求中國做出犧牲。兩者在實踐的過程會同時造成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上不一致的論述形象。以先前胡錦濤在 2005 年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首腦會議上所提出的「和諧世界」概念為例：中國政府在「和諧世界」概念的提出，理論上是希望倡議某種和平秩序的立場或目標，^②以維護世界的穩定、減少國際間的戰爭與衝突。殊不知，中國的「好心」，常常不但沒有「好報」，也很難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當中獲得認可。尤其之後（特別在 2009 至 2012 年之間）與其他亞洲周邊國家在南海海域劃界、島嶼歸屬的問題上，發生一系列的衝突，導致西方的觀察家相信，中國仍然逃不出國際現實政治的權力邏輯、安全困境問題，以及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對於外交關係中和平主張的限制。^③至於胡錦濤先前所宣示的「和諧世界」目標，也就顯得格外諷刺。的確，中國的外交政策常常令外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中國政府常常口裡不厭其煩地宣稱和平主義（例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平等、民主），但在實際作為上卻三不五時地表現出激烈的反應、展現強硬的立場。久而久之，觀察者也學會除了要「聽其言」之外，還要「觀其行」才行。

習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後，正式成為中國大陸新一代的領導人。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一樣對於過去所建立起的外交論述有著「守舊」／「繼承」與「突破」／「發展」的權衡思量。在「守舊」／「繼承」方面，習近平的外交政策仍然強調國內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的重要性，這與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目標一致。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目標仍是在於推動國內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實現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計畫。此外，習近平同過去領導人一樣，重視中美關係、重視大國關係、重申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友好方針、持續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深化中國在國際社會與多邊組織的角色等等。而在所謂的「突破」／「發展」方面，則是有更加重視國家利益在對外關係

時空背景下，對於特定議題或是事件所提出的新準則——例如，胡錦濤時代的和平崛起或是和諧世界概念——又往往跳脫舊有意涵。本文認為，「守舊」／「繼承」與「突破」／「發展」之間的關係是矛盾的、衝突的，據此，建構出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範疇。但由於在實踐上，「守舊」／「繼承」的行為需要表現出堅持自我（主權、利益）的形象，而「突破」／「發展」則需要改變自我，因而可能在外交立場上表現出不一致的結果。有學者便將此現象解釋為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一種「無定性」（*indecisiveness*）特質（Shih and Yin 2013）。至於此處所提到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有面對歷史上各項原則或目標的責任或壓力，作者認為，可能肇因於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傳統儒家政治文化與時間觀念等特性，但須另外撰文討論之。

註② 和平秩序若是作為「立場」，則表示中國大陸在不特定事件或原則問題的看法上是採取和平的、非武力的方式來介入；若是作為「目標」，則達到此目標的方式，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這也就是為何中國的和平秩序主張在實踐上可以是帶有暴力性質的。

註③ 關於中國的安全困境問題，見（Nathan and Scobell 2012）；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限制，見（Zhao 2013）。

中的座標作用、推動首腦外交和夫人外交、提出中國夢的願景、突出外事統籌協調、頂層設計、底線思維、推出新型大國關係、一帶一路，以及親、誠、惠、容理念經略等等。^④

比較值得觀察家注意的是，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奮發有為」、「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命運共同體」等等概念，與胡錦濤之前所發展出來的「和諧世界」、「負責任的大國」、「核心利益」等等概念相比，是否透露出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和平主張在本質上或風格形式上的變化？^⑤比方說，「中國夢」與「奮發有為」的概念，似乎在「主動」自我喚起一種新的愛國主義情操，強調中國人除了須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之外，更應該實現國家的富強。所以「中國夢」變成了一種「強國夢」（陳須隆、蘇曉暉 2014）。「奮發有為」也是單方面根本改變了從鄧小平以來到胡錦濤時代所奉行的「韜光養晦」政策論述，開始強調一種「創造性」地介入全球事務。^⑥但是，「新型大國關係」卻又是強調一種特殊的「雙邊關係」對待，有別於「命運共同體」的多邊框架。從論述的語境上看，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係」是在「中國夢」以及「奮發有為」之後所提出，而胡錦濤則是先有「和諧世界」、「負責任的大國」等說法，遲到 2010 年之後才提出「核心利益」的說法。換言之，若前者是一種藉由單邊的行動、特殊雙邊關係的建立、以及多邊外交的交往來進行和平外交，則後者可以看做是先有多邊交往的概念，才在此多邊框架下謀求自身利益的鞏固。因此，中國外交在風格形式上的改變，關心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建立的方式該是為何，並藉此保護自身利益。但西方觀察家似乎更在乎中國崛起的本質，到底對他們是一種威脅還是貢獻：一派的人認為，中國這些不同政策論述的表現都只是同樣地藉由指責西方中心主義、或是美國霸權的方式，來推行中國中心主義或者恢復中國王朝的舊秩序而已。另

註④ 相關論述衆多，雖然這些所謂的「突破」或「前進」理念到底與延續性的政策相比有多大程度的創新或改變，仍有待討論，但習近平在上台後不到兩年的時間，的確在論述上提出一些新的詞彙與詮釋，營造出耳目一新的外交戰略思想（陳須隆、蘇曉暉 2014；張清敏 2014）。

註⑤ 其實中國大陸自周恩來以降，一直奉行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周恩來時期的「和平共處」、鄧小平開始的「和平發展」，到江澤民時期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新安全觀」的實踐，均一脈相傳。但是本文認為，從胡錦濤時期所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目標開始，中國大陸的和平外交或是國際秩序觀，才開始與其自我在認知上做為一個崛起大國相呼應。而這思想內涵，也同時因為中國大陸學術界中中國學派的興起而開始從政策宣示轉變為具有理論意涵。關於此理論意涵的建立過程，見（Wang 2013）。而習近平在這樣的承接脈絡下，是否誠如許多西方媒體或觀察家所言，已經改變過去溫和的和平外交政策，而開始走向強硬、霸道的途徑？相關討論，見（Johnston 2013）。

註⑥ 中國大陸學者王逸舟在近期積極倡導所謂創造性介入的概念，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在其綜合國力提高、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同時，好好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或是國際事務當中的積極性角色。筆者在 2015 年 7 月於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也有受訪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已經走到一個重要的階段，需要開始積極思考，到底中國應該扮演甚麼樣的全球角色？到底中國目前的全球角色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相比，有何缺失？到底中國外交面臨何種困境？這些問題和思考雖然不見得和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或是「奮發有為」有何種因果上的關係，但似乎很恰巧的反應出官方與民間或是知識界都同樣在相似的時間點自我反思中國的全球性角色（王逸舟 2011; 2013）。

一派的人則認為，中國帶來的將是穩定與安全。^⑦

在以上對於中國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各種不同解讀與觀察可以發現，面對中國崛起採取肯定或正面態度的人，往往會關注中國的特殊性面向（例如，強調因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所導致的反霸權思想以及和平性格），與例外性面向（例如，中國不一定會造成大國悲劇）。而採取質疑或負面態度的人，往往會強調中國在普世性上應該要有的表現（例如，中國就是一般理論定義下的主權國家，與其他國家同樣面臨地緣政治上的安全困境、追求國家利益或權力極大化的等等問題）。本文認為，這些觀察都只是先從既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後設觀點出發，然後試圖在歸納或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論述之後，進行對中國崛起的理論化過程。其中包括，藉由對於新上任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政策解讀，來實證／否證中國是否有某種大戰略。^⑧其結果是，這個大戰略要不是符合了原先的負面預設，就是呼應了原先的正面看法，以至於形成一種二元分立的分析結論。

本文指出，無論是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正面解讀或是負面解讀，沒有哪一種單一的角度，可以完整地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外交政策（比如習近平政府），以及中國崛起本身的內涵。這並不是要天真地宣稱，所有可能的正負解釋的集合就等於是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完整理解。而是說，中國外交政策背後的哲學思量基礎，很可能與目前西方社會科學定義的方式迥異。在中國傳統哲學中，事物本身不是僅能被單一面向所決定。因此，和平外交的表現不能先被具有和平意涵的行為或是物質力量所定義，而是同時包含非和平面向；和平外交的實踐，也不該是限制在行為者（國家）所擁有的物質力量大小，而是其如何將這些力量化約為對於關係的重視或者破壞。根據秦亞青的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的基礎向來是「兼-同邏輯」（both-and logic），而非西方非黑即白的二元論（either-or logic）（Qin 2010）。兩者的差別在於，如果西方的二元論是藉由區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來確認自我的認同（前提是自我的本質具有一致的內在屬性），中國文化下的自我認同則是屬於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所形成的「大我」中的一部分。^⑨換言之，在二元論之下，中國崛起本身的意義只能是相對於自我，或是等同於自我，而不容許有模糊或是中庸的選擇。但是在兼同邏輯中，個體之間的差異與否並不

註⑦ 前者認為中國還是有一種緬懷過去帝國時期的心態。或許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霸權與美國不同，但這種新型態的中國式霸權，還是一種權力集中所造成的霸權，本質差異不大（Callahan 2014; Courmont 2012）。後者則是指出，中國的崛起或是民族的復興本來在歷史上就證明，對於區域秩序與世界穩定是一種貢獻而非威脅。從這樣的經驗來看，吾人本來就不該單純以西方的角度來過度解讀中國的意圖，而應該從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來理解中國才是（Jacques 2009; Kang 2007; 2010）。無論如何，由此不同的解讀來看，中國崛起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外交行為，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威脅的，端賴觀察者如何詮釋。

註⑧ 即所謂全球性的、全方位的以及長遠的戰略計畫（Goldstein 2005）。

註⑨ 換言之，大我認同的重點不在於個體本身是否具有一致性，而是在於大我下個體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被統合在一起（例如接受禮教），即便之間具有差異性。中國當代最早討論「大我」與「自我」概念的區分，可見於梁啟超的著作（1999），例如〈余之生死觀〉一文。關於中西方文化傳統對於「大我」、「小我」兩者的分析比較，見（Barbalet 2013）。

是一個大問題，而是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在一個大我認同之下獲致和諧或是穩定，才是首要目的。

在此「兼-同邏輯」的認識論基礎上，本文試圖將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外交政策與其前一代領導人胡錦濤做出比較，並且視其差異為一種風格性的對照，而非一種本質上的衝突。此種風格差異可視為兼同邏輯的不同形式表現，但同為達到大我認同之下各種不同主體（例如國家）關係間的和諧或穩定而作出努力。本文利用國際政治中三種維護國際秩序穩定所發展出來的外交關係模式—即，單邊主義、雙邊主義、多邊主義—來說明習近平目前主政下的外交風格，為一種「單邊-雙邊主義」的關係模式，有別於胡錦濤的「單邊-多邊主義」風格，並試圖提出初步性的歸納看法與反思問題。

貳、三種維護國際秩序的關係模式

本文將國際政治中，國家間試圖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所發展出來的和平外交行為，歸納成三種關係模式¹⁰。第一種模式為「多邊主義」，強調三個以上的多個國家或行為組織，透過制度化協商機制與法條規範，集體進行協商、溝通、與合作。全球性的聯合國組織、或是區域性的東協組織（ASEAN），便是此多邊主義機制的一種表現。第二種模式為「雙邊主義」，指涉利益關係的兩國，針對特定的議題或項目進行對話或合作。美國對於某些亞洲國家，例如南韓、日本、菲律賓等，進行個別的經貿或是安全協定便是一例。第三種模式為「單邊主義」，強調單一國家獨自做出某項決定或行為，無須經過其他國家個別或集體的同意。美國在沒有經過聯合國的同意之下，於2003年出兵攻打伊拉克便是單邊主義的表現。中國在兩岸經貿關係上所做出的一些讓利措施，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單邊主義的表現（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0）。以下針對此三種關係型態，進行理論的定義、實踐的分析、以及潛在問題的探討。

一、多邊主義的模式

首先，多邊主義所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必須依賴集體的約定與安排（Ruggie 1992）。所謂「集體」，一般是指涉超過三個以上的國家行為體，透過合作的方式處理共同的挑戰或是威脅。然而，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倒不是在於其參與合作國家的數量（quantity）問題，而是其質量（quality）問題。John Ruggie（1993, 11）指出，多邊主義所形成的國家合作框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參與其中的國家都必須某種程度上依賴「通則化的行為準則」（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這些準則明確規定了哪些行動才是恰當的行為，而無須指涉特定對象或是緊急情況下的特殊利益」。如果說這些

註¹⁰ 在這裡的「關係」，不是狹隘地指稱一國如何建立起與他國的政治、經貿、文化等等的外交關係，而是更強調一國與他國如何共同地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所設計或發展出來的制度與策略。但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共同的「國際秩序」，更容易用「共同的關係」、「大我」來解釋。

「通則化的行為準則」是構成多邊主義框架主要的因素之一，則這個框架勢必會要求其中的所有國家參與者具備一種普世的理性概念與正義價值觀，並且因此形成一種對於國家在判斷事物正確性、或錯誤性的指導原則。這種指導原則事實上會讓國家之間的妥協或和解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因為，不同國家基於其歷史文化宗教上的差異，可能會對於同一議題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解讀。

國家之間根據多邊主義框架所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最先盛行於冷戰之後。在此時期，多邊主義的相關論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除了是因為美國與前蘇聯兩大陣營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競爭已經畫下句點（Fukuyama 1992），更同時是因為伴隨著全球化現象的興起，促使一種國家間應該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氛圍出現。在此種全球化氛圍的背後，則是一種自由民主主義的看法，要求傳統的民族國家讓渡出部分的政治主權，並且分享給其他各種新的非國家行為者來參與國際事務，形成一種新的集體全球治理方式（Strange 1996）。

然而，這種在多邊主義框架下的新型集體治理型態，面臨到一個國際政治當中的難題，就是，在現實國際政治中所組成的這些多邊主義框架，例如像是最早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之後的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都是呈現了無政府社會的縮影。誠如 Hedley Bull（1997, 45）所言，「在當代國際關係的討論中一直有一個主題，那就是，由於無政府狀態的現實情況，國家並無法一起真正組成某種形式的社會；如果國家間要是真的是組成了某種形式的社會，那也是因為他們將自己臣服於一個共同的權威」。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這種對於「共同權威」的需要，以及國家藉此來追求共同利益的行為，早已被政治經濟學家像是 Charles Kindleberger（1981）以及 Mancur Olson（1965）等人解讀為一種集體行動的問題。據此，解決此問題的方式必須由一個單一的、強有力的領導者（或是霸權）來提供公共財（或者說是共同利益），並且適時地處罰那些違規者（Lepgold 1998）。如同 Beth Yarbrough 與 Robert Yarbrough 所觀察到的，對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成立的那些國際組織而言，最嚴重的威脅就是如何處理執行（enforcement）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就像是囚徒困境一樣，每個國家都隨時受到誘因去違背共同承諾、從事投機的行為（Yarbrough and Yarbrough 1986）。對於某些研究者而言，後冷戰時期裡國家間多邊合作的成功與否，就是端賴美國是否有能力將不同的參與者一同帶到談判桌上來協商（Haass 1999）。

在現實國際政治中關於集體行動的問題，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尤其在可預見的美國霸權衰弱的將來，到底自由主義制度所標榜的國家間合作關係是否還有可能持續？Robert Keohane（1984）認為，「霸權衰弱之後的合作是有可能的，但是不只是因為國家間共享的利益可以導致國際建制（regimes）的形成，而且還是因為維持原有建制的成本少於當初創造它時候的情況」（Keohane 1984, 50）。對於 Keohane 而言，不管霸權有沒有存在，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都有可能維持。因為，國際建制可以取代霸權的角色，幫助參與的國家行為者去追求共同的、互補的利益；國家也會透過對於國際建制的參與，來瞭解其共享的利益有哪些，以及透過參與而受到國際建制的規範，讓合作具有約束力。Keohane 這裡的說法無形中呼應了早先 John Ruggie 所提及的，對於

多邊主義架構最重要的倒不是參與國家的數量問題，而是其質量內涵。換言之，參與的國家行為者在參與過程當中，有多大程度受到通則性行為規範的教化與約束，進而內化成各個不同行為者所共享的理性思考與抉擇動力。

二、雙邊主義的模式

在國際政治中，雙邊主義的和平外交關係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建立。^①一種是藉由「相互保證摧毀」的策略 (the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這種 MAD 策略最早是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過程當中所發展出來的。此種和平關係的建立是奠基在雙方的恐怖平衡之上。對於同時擁有核子武器的美國或者前蘇聯而言，沒有哪一方會願意率先發動核子戰爭。因為，任何一方的此項作為將會導致另一方的核子反擊，造成雙方的同歸於盡 (George and Smoke 1974; Kahn 1960)。在此 MAD 策略背後的預設邏輯是，參與的雙方國家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也因此都瞭解到，任何核子衝突的發生都將對雙方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以及自身的滅亡 (Schelling 1966)。簡言之，如果國家都是理性的 (也應該是理性的)，只要想到任何自我發起的衝突行為可能只是一個無利可圖的行為，則雙方都會因為此種理性認知而試圖去維持一個穩定的 (雖不見得是友好的) 雙邊關係。

然而，MAD 策略背後的理性邏輯面臨兩種問題。一是，在冷戰的衝突時期，前蘇聯在看待與美國的競爭或衝突關係時，不見得會是從美國那種理性模式的觀點出發。換言之，如果原先理論所預設的理性邏輯無法同時適用在雙方身上，則原本推論出來的恐怖平衡關係也就不一定會成立，甚至造成無法預見的衝突。另一種問題是，如果在 MAD 策略所營造的雙邊關係中，前蘇聯 (或其他的行為者) 的確是遵循美國的理性思考邏輯，則雙方將會無法避免永無止盡的軍備競賽。因為，任何一方防衛性的 (而非侵略性的) 軍事建制、或即使是一般的軍備維持，都會引起另一方的擔憂而強化軍事競逐，以避免軍事實力的差距過大。^②這種因為擔憂、或是懷疑所造成的軍備競賽，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理論中著名的「安全困境」問題 (Jervis 1978)。

第二種雙邊和平外交關係的建立，則是透過信心建立措施的機制 (confidence-building)。這個機制建立的目的，在於從交往的兩個國家之間培養出信任；藉由信任的建立，希冀減緩因為國際政治中無政府特性下所產生的安全困境效應。因此，透過一系列雙邊協同的建立，國家彼此交換雙方對於各自軍事力量與裝備的訊息。當每一個國家行為者的意圖以及行為，能夠為另一方所瞭解及預測時，自然而然就會降低安全困境對於雙邊國家關係的限制。然而，信心建立措施機制的最主要缺失在於，由於

註① 雙邊關係的建立不必然以本文介紹的兩種為限。其他可以包括以利益為考量的經貿協議、技術合作援助、司法互助等等。本文僅以安全理論上所熟知的兩種和平主義理論，來說明特定雙邊關係的建立與實踐。

註② 例如台灣蘋果日報在 2015 年 9 月 4 日的頭版標題〈中共裁軍 30 萬，對台威脅更大〉，以及國民黨軍系立委的訪問稿，均對於中共的 30 萬裁軍計畫，表達高度擔憂。裁軍的事實不必然提升他人的安全感。

安全困境是一種結構性的物質因素所造成，在兩個國家間的資源不對稱（例如大國對小國）的情況下，大國通常難以從小國那贏得信任。舉例而言，美日的同盟關係一直是被視為現代國際關係史中最為長久以及緊密的雙邊關係（Pempel 2004）。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到，同時存在於日本政策制定者計算當中的，是他們的「避險策略」（Hughes and Fukushima 2003, 59）。如同 Hughes 與 Fukushima 所觀察到的，在冷戰以及冷戰結束之後的時期，雖然日本與美國維持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雙邊聯盟關係，但是日本一直都是企圖在美國面前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美國在對外關係的建立上，除了先前的多邊主義模式之外，還包括雙邊主義。舉例而言，在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重建過程當中，美國對於歐洲以及亞洲便是採取不同的交往模式。根據 Gould 與 Krasner 的觀察，德國與日本雖然在戰後都受到美國在經濟上與安全上的保護，但是前者與美國的扈從關係（bandwagoning）是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發展出來，而後者卻是從一種雙邊但不對稱的利害關係中衍生出來（Gould and Krasner 2003）。解釋這種差異性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歐洲式的多邊主義模式所依賴的是一種通則信任（general trust），而美國在亞洲的雙邊模式則是基於策略或戰略信任（strategic trust）來與個別的亞洲國家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Brian Rathbun（2012）指出，通常是信任（而非不信任）才能促成國家之間一開始的合作與制度建立。然而，「通則信任」比較容易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發揮作用，並且對於參與的國家產生價值信仰上內化的效果與拘束力。「戰略信任」只能適用於特殊的情況（但無法通則化），並且這種信任較多是發展成對於他者利益上的興趣。如果我們觀察亞洲目前雙邊關係的情況可以發現，大多是因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圍堵政策設計之下，所形成的個別雙邊安全或經濟協議，包括與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所建立起的雙邊關係（Nau 2002）。在這幾個國家之間，例如南韓與日本，彼此間仍然因為歷史上尚未解決的仇恨記憶，而未能發展出友好的雙邊政治關係。更不用提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仍有不同的政治問題，以至於要發展出通則信任更是難上加難（Ruggie 1993, 11）。Nobuo Okawara 與 Peter Katzenstein 認為，「在日本與亞洲太平洋的案例中顯示，（多邊主義之所以無法形成）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多邊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尚未在東京或是其他亞太國家的首都中，成為一個為集體所接受的、牢固的、毫無疑問的規範」（Okawara and Katzenstein 2008, 104-132）。

三、單邊主義的模式

如果吾人從近代國際關係的發展來看，可以發現到前述所提到的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框架，或多或少都可以視為美國在全球外交政策布局底下的一種產物。另外，還有一種行為是藉由片面的、單邊的行動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或是和平的外交關係，我們稱之為單邊主義。美國常常自恃其軍事、經濟力量的獨霸，^⑬以及對於美國例外論

註⑬ 關於美國國防預算的支出變化以及與其他大國之間的差距，見（Walker 2014）。

的信仰，為其單邊所主導的軍事行動或經濟干預做出合理化的論述。^⑭小布希政府在 911 事件之後的全球反恐行動就是一例。^⑮但是在最近的英文文獻討論中，西方觀察家對於單邊主義的討論，集中在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在討論美國自身國力衰退的問題，第二個面向則是在擔憂美國潛在的最大競爭者與威脅者—中國。前者關心的是，在美國因為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的國力衰退之後，^⑯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採取的片面調整，是如何有利或有害於美國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進而鞏固國際秩序與和平。正反兩方的支持者均有，但辯論背後的理論基礎仍脫離不了傳統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由來已久的觀點歧異（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2012; Haynes et al. 2012;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1）。在第二個面向討論中所在意的則是，於美國持續衰落但仍獨大的過程中，崛起的中國很可能用相同的單邊主義邏輯（例如因為不滿現況而欲尋求改變）來挑戰美國、取代美國，甚至最後造成兩大國之間的戰爭（Monteiro 2011; Schweller and Pu 2011）。特別是第二種面向的討論，呼應了國際關係文獻中對於中國崛起的評析與預測，認為中國崛起的過程並不會表現出任何與其他歷史中崛起大國不同的特殊路徑。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崛起的路徑只有幾種選擇。一種是中國會如同美國一樣透過單邊主義的方式來挑戰美國霸權並且取代之。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各種雙邊關係的整合來抗衡美國的霸權（Ross 1999）。兩者都是基於權力平衡的概念來看待中國。這是一個客觀結構問題，而非關係到中國自身主觀的認知或是意圖（Mearsheimer 1994）。也因此，中國的崛起不論在胡錦濤或是習近平主政之下，其差別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大。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的「中國夢」理念，或是「生命共同體」論述，只不過是印證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其領導人對於舊中國秩序的緬懷，或是將來抗衡美國地位的線索。

無論如何，少有研究注意到中國自身的單邊主義並非是由物質結構的改變（例如權力失衡）而來。相對地，基於文化的理由，中國的單邊主義是用來打破政治關係上的僵局或是失衡所不得不採取的作法（Shih 2014）。例如，中國為了維持穩定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往往必須利用重複片面的和平外交宣示來消弭其他國家所受到的威脅感，或甚至利用片面的讓利舉動來彌補流失的多邊或雙邊關係平衡。^⑰儘管如此，中國的單邊讓利或是妥協，除了是原則性的宣示之外，往往具有互惠的期待。若接受中國善意的多邊或雙邊對象不領情，持續無視或是誤解中國的用意，則中國單邊的讓利或是妥

註⑭ 所謂合理化的論述，可以是狹隘地認知到自身國家利益與安全受到威脅，或是廣義地認為國際規範受到挑戰與侵害。兩者均時常伴隨在美國的單邊主義論述中，例如美國對北韓所實施的經濟制裁。參見美國財務部與國務院所公告的對北韓經濟制裁說明文件：OFAC (2016)、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2016)。

註⑮ 關於小布希反恐行動之後，各界對於美國外交政策是否（又）開始由單邊主義所主導的討論，以及其背後的歷史成因，請見（Skidmore 2005）。

註⑯ 例如 2001 年之後的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所導致的軍事財政過度支出，以及 2008 年次貸風暴之後美國的經濟蕭條，都讓美國人認知到自身國力的衰退。

註⑰ Charles L. Glaser (2004) 曾用理性抉擇理論來解釋為何自我犧牲、或是自我克制的行為，會在一種雙邊或是競爭的國家關係當中出現。

協，很可能轉變成對抗性的行爲。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錦濤和習近平均有運用單邊主義的行動來維持對外關係的穩定、和平與發展。但不同的是，胡錦濤所面對的是中國威脅論的背景，因此讓其首先嘗試強調，中國崛起的路徑是加入現有的西方多邊組織與框架，並且希望持續維護和平與發展的目標。但是當胡錦濤發現和諧世界的主張持續被西方世界挑戰之時，只好提出「核心利益」的說法，以讓他人體會到中國之前提出和諧世界的善意有多麼需要受到認真對待。相對的，習近平所面對較多的壓力則是來自於美國在多邊組織框架中的打壓，因此，如何一方面重新建立起中美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繞過既有的限制，成爲習近平剛上任之時最大的課題。

參、胡錦濤時期的政策實踐

從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參與國際多邊組織的數量與質量上來看，無疑是令西方人印象深刻的 (Hachigian, Chen and Beddor 2009)。對於西方的觀察家而言，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便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建制。重點不光只是在於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大增，而是在於中國越來越因爲這樣的參與過程，內化了國際上共享的規範與價值觀 (Johnston 2008)。尤其當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在國際多邊組織參與的成就上達到了新的里程碑。但是，當中國進入胡錦濤主政的外交時期，適逢西方世界討論中國威脅論的另一波高潮 (郭武平等 2006)。胡錦濤一開始的外交政策是先延續先前江澤民時期的「和平發展」政策以及「新安全觀」；接著，胡錦濤於 2005 年 4 月，首先在亞非高峰會議當中，提倡亞非國家應該倡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平等對話，共同建立和諧世界；又在 2005 年 9 月，於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元首峰會上，詳細闡述其和諧世界觀。這些作爲，均在強調推動多邊主義框架的重要性，^⑧包括：堅持多邊主義，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商的機制；其次是追求共同繁榮、建立開放公平的多邊貿易體制；最後是和諧世界，堅持包容精神以及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在具體的外交行動上，胡錦濤政府於 2003 年主動安排了北韓與美國等國家的六方會談，試圖建立起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同年，也針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提出了中國將「和平崛起」的立場。而在 2004 年開始，胡錦濤政府在全球開辦孔子學院，試圖藉由實踐「軟實力」的概念，向全世界推動具有和平特質的中華文化。另外，根據研究，有別於江澤民拒絕參與八國集團，胡錦濤政府開始參加八國集團的國家領導人對話會。再者，時至 2008 年爲止，胡錦濤政府主政下的中國共參與 22 次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其次數比胡主政之前十二年來累積的還超過七倍之多 (鄭宇碩 2009)。儘管胡錦濤主政時期將中國外交關係的建立重心放在多邊組織的參與、強調一種多邊型態的

註⑧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大陸廣泛參與國際或區域的多邊活動，前任的江澤民也積極在做，因此，胡錦濤的多邊外交模式斷不是自胡錦濤開始。本文有鑑於篇幅的限制，暫且只利用胡主政的外交特點來與之後接替的習近平政府做比較。

認同，但很多時候仍招致負面的批評。例如，胡錦濤時期對於非洲國家的發展投資計畫，被西方觀察者視為只是另一種從前西方殖民主義的復辟而已（Sharife 2009）。在此脈絡下，胡錦濤於主政後期發展出所謂的「核心利益」概念，看似在向西方或周邊國家闡述中國政府如何堅持重大國家利益的立場與決心，但無不可也視為是中國利用此核心利益的論述來強調中國在和諧世界論述立場中的妥協是有多麼不容易。

本文將胡錦濤主政下這種「多邊」、「單邊」相互發展的策略視為所謂的「單邊-多邊主義」模式。模式中，中國藉由單邊主義的方式來提高其在多邊主義框架中的立場之價值，進而希望鞏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穩定關係。中國逐漸接受原先西方國家所創立的多邊組織框架，將多邊主義成為自我外交行為考量上的重要依據，鞏固既有的多邊主義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多邊主義成為中國所片面設定的一種大我認同投射。只是，這樣的認同並不代表中國必須一味的配合。「互惠」成為此多邊主義中維持關係穩定或和諧的一個重要條件，畢竟，多邊關係中的各個成員都是「大我」的一部分，而非僅有中國一員。這也就是為何中國在多方配合與參與多邊組織活動的同時，還必須不時強調其核心利益，用以提醒其他人將心比心的尊重中國自身的利益，以維持大我之下的關係穩定或和諧。

胡錦濤主政下的「單邊-多邊主義」模式並非獨屬於中國所特有。相對地，如之前章節所述，美國早就將「單邊-多邊主義」行之有年。不同的是，若中國是以單邊主義來彰顯其在多邊關係中的角色，則美國是藉由多邊主義框架來確認自我認同中的某些普世價值（例如民主、自由）獲得實踐。根據觀察，美國從 90 年代以來，對於多邊主義的框架一直採取一種「選擇性的」或是「矛盾的」、「不確定的」態度（Malone and Khong 2003）。換句話說，美國雖然一方面在推動多邊主義作為國際規範的努力上扮演著領導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美國推動的意願卻是端賴是否進行中的多邊主義框架有利於、或是有損於美國實現其國家利益的目標。有些時候，美國會利用多邊主義的框架來滿足其對於單邊主義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是建立在一種對於「美國例外論」的信仰上（Kingdom 1999）。相對而言，中國一直也有類似的中國例外論信仰。從近幾年來中國知識學界所欲推動建立的中國學派開始，到坊間媒體鼓吹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等（Wang 2013, chapter 2），以及官方所一直強調的中國國情、中國特色（新華社 2012），都是這種信仰的呈現。不可諱言，兩種例外論都呈現出一個大國所擁有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然而，美國的自我中心主義在實踐上是仰賴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而目前的中國特色主義則是表現在對於西方普世價值干預上的抗拒。此種抗拒若是放在大我的認同框架內來理解則是一種對於互惠尊重的要求，但若是放在二元論的認識論中來看，則做實了中國威脅論的說法。

肆、習近平時期的政策實踐

習近平上任之後所面對的局勢是，中國已經因為改革開放而與世界接軌、參與全

球事務與建置一段時間，但其在這些建置中的地位仍不受尊重與公平對待。因此，國內要求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聲音不斷被提出 (Wang 2015)。中國自我認知在多邊組織中所受到的阻礙有許多，但美國的影響一直是一個關鍵。這也就是為何，習近平在 2011 年 1 月胡錦濤與美國歐巴馬達成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的協議時，便首次提出中美之間應該建構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中國首次片面提出的雙邊關係方案。又進一步，習近平與歐巴馬在 2013 年 6 月見面時，雙方對於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達成共識，即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倪世雄、潛旭明 2014)。習近平一直強調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沒有道理的。除了如同某些學者所觀察到的，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可能都會如同習近平一樣，希望藉由擺脫舊型大國關係所帶來的衝突對抗關係，避免大國爭霸的歷史悲劇再度重演 (秦亞青 2014)。本文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習近平感受到多邊主義框架不見得是一個適合與美國等大國做深入交往或是談判的平台，而寧願選擇採取雙邊的途徑直接面對美國。^⑩好處在於，中國一方面將中美關係與其他國際關係切割出來，避免受到形式性或制度性的圍堵。另一方面，中國可以順理成章將中國與其他不同大國之間的關係，視為單一、個別、或者獨特的關係來處理與對待。再者，中美的和諧關係若是成功建立，將對其他的大國關係具有示範效用。^⑪

從習近平上台之後的頻頻出訪便可看出這種「單邊-雙邊主義」風格。上任不到一年的時間，習近平就訪問了十四個國家，首站先抵達俄羅斯，試圖增進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後又陸續訪問坦桑尼亞、南非、剛果共和國、中美洲國家、美國、中亞國家、東南亞國家等等。總理李克強也在同樣的時間內訪問歐洲大國、非洲、中南美洲、亞州等國家。中國與每個國家之間又都依據不同的關係發展階段，建立起不同的經濟、戰略互惠夥伴關係。這些做法，符合中國一貫的原則，認為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沒有需要用一套普世的標準與各國交往，而雙邊關係的建立是最能滿足這樣的需求。當然，這些雙邊關係的建立，可以被視為都是為了一個目標的實踐，即「中國夢」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周楚卿、惠夢，2013；蘇楠，2013)。換言之，這也不過就是現實主義中對於國家利益的實踐而已。但是在兼同邏輯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就成了一個個各自獨立的大我關係，在這個大我關係之下，我與他者之間並不是對立而存在，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國夢是可以大家來參與完成的。這也就是為何習近平之後所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並非是另起爐灶一個多邊制度來取代現有的多邊體制，^⑫而是讓不同的國家也參與到中國夢的計畫，進而帶動各種不同雙邊關係的發展。

註⑩ 根據中國學者王緝思的觀察，中國的外交的轉型是「十年變一變，逢九變一變，現在的轉變就是從 2009 年開始的。2012 年到 2013 年適逢黨和國家領導人換屆，促使外交出現更加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動因主要來自國內對於西方政治滲透的更大警惕。」(王緝思 2016)。

註⑪ 筆者認為，習近平的外交特色多是以雙邊主義帶動，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習近平比較習慣和單一的國家，諸如美國、英國、韓國等交手，獲致成果之後，再用以進行國際宣傳，試圖用同樣的模式，讓其他國家比照辦理。

註⑫ 雖然原因也與中國試圖在目前多邊制度中進行改革的受阻有關。

將胡錦濤的多邊參與與習近平的雙邊發展做出區分，並非表示習近平政府是放棄多邊主義的參與。而是，與胡錦濤時期相比較，習近平目前為止似乎更熱衷於加強各種雙邊關係的對話，儘管這個雙邊關係發展是常常利用多邊的場合來進行（俞正樑 2014）。

的確，中國的單邊主義實踐—不管是胡錦濤時期或是習近平時期—在西方觀察家眼中，很難與和平外交聯想在一起。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的處理，已經讓西方社會深信中國正朝向強硬、或甚至是侵略性的方向發展（Johnston 2013）。中國在實踐單邊主義的困境在於，中國的外交宣示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自說自話的政治口號，不被認為代表任何實質意義。比如，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雖不厭其煩地表示是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但是往往遇到菲律賓或是越南的挑釁時又會馬上還以激烈的手段，讓人無法相信其和平意圖。癥結點在於，中國任何的片面外交論述都含有一種大我的預設，而此種預設又往往帶有對於他者互惠回應的預期。如果中國此種大我預設不被其他國家認可或是採信（不管是胡錦濤的多邊參與或是習近平的雙邊建設），往往會被看做是一種自說自話的宣傳或甚至是另一種中國中心主義的威脅（尹繼武 2014）。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如果自身的承諾只是變成他人眼中的自說自話，或者是利用的工具，那麼原先的雙邊或多邊關係，與其保留著，還不如破壞掉重新建立。這也說明了中國的和平外交內涵向來伴隨著懲罰性手段，而後者又是端賴交往對象的意圖（是否願意一起維護大我之內的關係）來決定。這種破壞的目的倒不是真的想要徹底破壞雙邊或是多邊關係，而是要藉此提醒他人中國在多邊或是雙邊的立場是該被認真對待。^②這也是為何中日或者是中美關係常常被認為是起起伏伏、時好時壞的雙邊關係。因為，常常是中國表現出片面的讓步姿態之後，不被日方或是美方所理解，然後在得寸進尺之下激怒中國，使得雙邊關係回到原點，又在中國片面和平攻勢的驅動下開始新的發展。^③

伍、結 語

回答本文最初關心的問題，習近平時代所帶來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從本文研究發現，不管是習近平還是胡錦濤時期，中國追求自身與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就此目的而言，其本質依然不變。這個目的——一種中國觀點的和平主義——已經逐漸形成中國在對外關係建立上，對於自我與他人之間所預設的「大我關係」中的一種「片面共識」。然而，習近平的和平外交政策絕非只是「胡」調重彈。從風格區分而言，胡錦濤時期慣以利用多邊框架來建立中國與其

註② 有人稱此為「和諧性規訓」（harmonious disciplining），其實就是美國常用的胡蘿蔔與大棒手段（the carrot and the stick）（Shih and Yin 2013, 75）。

註③ 關於這種對於中日、中美關係的起起伏伏、時好時壞的體認分析，見（Wang 2013, chapters 4 and 5）。

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之間的大我關係，而習近平時期則是利用雙邊框架來建立。換言之，胡錦濤時期重視由多邊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和平關係，而習近平時期則重視由雙邊關係所建構得來的和平安全，特別是與美國之間能否建立起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由於美國總統大選剛落幕，選出了一位在意識型態上較為右派、反中的川普，更讓習近平政府急於抓住機會，希望能在目前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情勢中，能重新確立兩個大國之間對於彼此「關係」的存在是否有共識、其內涵又是為何？據報導，今年（2017）二月底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篪的訪美、以及接下來四月習近平與川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第一次會面，都顯示中國方面急於率先改善、穩固、甚至建立新的雙邊關係，以打破目前「從未如此複雜與冷淡」的中美關係（Landler 2017）。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其「奮發有為」的理想，並非是要脫離原先胡錦濤「和諧世界」的外交政策，或甚至與美國抗衡。從中國大陸各項和平外交論述的檢視中我們發現到，習近平如同胡錦濤時期的外交政策一樣，一方面對世界承諾其維護和平與發展的決心，另一方面又要求自身的國家利益應該被照顧到；一方面強調相互尊重、合作互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與周邊國家或是大國計較各種大大小小的領土主權或是國際權利。這種看似衝突或是矛盾的表現，實際上體現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來是講究互惠與正反並存的。換言之，對中國而言，體現中國的核心利益，並不等於就要犧牲或是侵犯他人的利益；實行市場經濟，不代表就要消滅原先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太平洋足夠容得下中國與美國兩個大國；實現中國夢不代表就必須要消滅美國夢。

本文以胡錦濤時期的「單邊-多邊主義」與習近平的「單邊-雙邊主義」為例，說明如何在「兼同邏輯」的認識論思想上，理解中國利用單邊的原則宣示、行動參與、政策讓利等等，讓其預設的大我想像，從多邊關係或是雙邊關係的模式中獲得滿足。本文所區分的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的風格差異，都可以從美國過去在全球治理中，利用多邊主義框架與雙邊主義框架的實踐來做參照。這除了讓我們瞭解胡錦濤時期的外交特色是重視多邊關係的維持、習近平是雙邊關係的維持之外，也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與美國或是西方世界的衝突，不見得只是因為結構性變化所造成（例如中國崛起所造成的權力改變）。更深層的原因可能還在於對國際秩序認識的不同。當西方的認識論是以二元論為基礎時，將他人改造成與自己有相同信仰價值的過程成了自身安全感的來源。但是當中國是以兼同邏輯為基礎來認識世界時，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怎樣在一個多邊框架或是雙邊框架之下維持平衡或者和諧共存，才是自身安全感的來源。而中國片面的的行動或宣示成了其用來表達自身善意的基本手段。

* * *

Mainland China's Unilateral Peace Diplomacy and the Relationality Model: Is Xi Jinping Articulating a New Strategy, or Just Playing Hu Jintao's Same Old Tune?

Hung-Jen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as faced the dilemma between defend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making compromises with the Western world: ensuring self-interests vs. making self-sacrifice. Wh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owed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 “Chinese dream”, he put forward an idea of forg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owever, it remains in dispute whether President Xi's “Chinese dream”, with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known as *fenfa youwei*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implies an intention to challenge U.S. pow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ina's new diplomacy, especially China's unilateral peace policy, and discusses whether and what is new about this diplomacy.

Keywor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ace, Relationality, Unilateralism

參考文獻

- 中國評論新聞網，〈溫家寶：讓利給台灣，因為我們是兄弟〉，2010，<http://hk.crntt.com/doc/1012/5/8/8/10125880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258806>，查閱時間：2016/04/01。China Review News. 2010. “Wen Jiabao: rangli gei taiwan, yinwei women shi xiongdi” [Wen Jiabao: “Make Concessions to Taiwan because We are Brothers”]. (Accessed on April 1, 2016).
- 尹繼武，2014，〈單邊默契、信號表達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9：4-33。Yin, Ji-wu. 2014. “Danbian moqi, xinhao biaoda yu zhongguo de zhanlve xuanze” [Unilateral Consensus, Signaling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9: 4-33
- 王逸舟，2011，《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Wang, Yi-zhou. 2011. *Chuangzaoxing jieru: zhongguo waijiao xin quxiang*. [Creative Involvement: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王逸舟，2013，《創造性介入：中國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Wang, Yi-zhou. 2013. *Chuangzaoxing jieru: zhongguo zhi quanqiu juese de shengcheng*. [Creative Involveme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Global Rol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王緝思，2016，〈中美最激烈競爭在於國際政治規則〉，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doc/1040/7/0/9/104070948.html?coluid=93&kindid=15470&docid=104070948&mdate=0105003457>，查閱時間：2016/04/01。Wang, Ji-si. 2016. “Zhongmei zui jilie jingzheng zaiyu guoji zhengzhi guize” [The Strongest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ules]. *China Review News*. (Accessed on April 1, 2016).
- 周楚卿、惠夢，2013，〈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5434.htm，查閱時間：2016/04/01。Zhou, Chuqing and Meng Hui. 2013. “Xi Jinping: zai di shier jie quanguo renmin daibiao dahui di yi ci huiyishang de jianghua” [Xi Jinping’s Speech at First Session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Xinhuanet*. (Accessed on April 1, 2016).
- 俞正樑，2014，〈雙輪驅動，全球擴展：2013 年中國新外交〉，《國際觀察》，2：1-15。Yu, Zheng-liang. 2014. “Shuanglun qudong, quanqiu kuozhan: erling yisan nian zhongguo xin waijiao” [Dual-Wheel Global Expansion: China’s New Diplomacy in 2013]. *International Review* 2: 1-15.
- 倪世雄、潛旭明，2014，〈十八大以來的中國新外交戰略思想初探〉，《學術前沿》，(6)：72-83。Ni, Shi-xiong and Xu-ming Qian. March 2014. “Shibada yilai de zhongguo xin waijiao zhanlve siziang chutan” [Analysis of China’s New Diplomatic

- Strategy since the Eighte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rontiers* (6): 72-83.
- 秦亞青，2014，〈妥善處理中國外交中的三大關係〉，《戰略決策研究》，5：11-12。Qin, Ya-qing. 2014. “Tuoshan chuli zhongguo waijiao zhong de sanda guanxi” [Properly Coping with Three Major Relations in Chinese Diplomacy].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5: 11-12.
- 張清敏，2014，〈理解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外交評論》，2：1-20。Zhang, Qingmin. 2014. “Lijie shiba da yilai de zhongguo waijiao” [Understanding China’s Diplomacy since the Convent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iplomatic Review* 2: 1-20.
- 梁啓超，1999，〈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發行。Liang, Qi-chao. 1999. *Liang Qichao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 郭武平、吳昆財、孫國祥、連錦水、蔡昌言，2006，〈中國和平崛起：國際社會之威脅或夥伴〉，《歐洲國際評論》，2：167-209。Kwo, Wu-ping, Quen-tsai Wu, Kuo-shyang Sun, Chin-shui Lien, and Chang-yen Tsai. 2006. “Zhongguo heping jueqi: guoji shehui zhi weixie huo huoban” [China’s Peaceful Ascendancy: Threat or Partner to the World Commu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2: 167-209.
- 陳須隆、蘇曉暉，2014，〈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戰略新思想〉，《和平與發展》，6：5-22。Chen, Xulong and Xiaohui Su. 2014. “Shiba da yilai de zhongguo waijiao zhanlve xin sixiang” [New Thinking on China Diplomatic Strategies since the Convent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eace and Development* 6: 5-22.
- 新華社，2012，〈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2.htm，查閱時間：2016/04/01。Xinhua News. 2012. “Hu Jintao 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 shiba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de baogao” [Hu Jintao’s Report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ccessed on April 1, 2016).
- 鄭宇碩，2009，〈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二十一世紀評論》，116：11-20。Cheng, Joseph Y. S. 2009. “Shiqi da yilai de zhongguo waijiao zhengce” [China’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wenty-first Century* 116: 11-20.
- 蘇楠，2013，〈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全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4/c1024-20892661.html#>，查閱時間：2016/04/01。Su, Nan. 2013. “Xi Jinping zai mosike guoji guanxi xueyuan de yanjiang (quanwen)”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Moscow Stat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ll text)]. (Accessed on April 1, 2016).
- Barbalet, Jack. 2013. “Greater Self, Lesser Self: Dimensions of Self-Interest in Chinese Filial Piet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4 (2): 186-205.
- Brooks, Stephen G.,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2. “Don’t Come Home,

-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3): 7-51.
- Bull, Hedley. 199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2016. “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http://www.state.gov/r/pa/ei/bgn/2792.htm> (October 20, 2016).
- Callahan, William. 2014.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Asian Thought on China’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Niv Horesh and Emilian Kavalski.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Richard Smoke. 1974.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2004. “When Are Arms Races Dangero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4): 44-84.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Erica R. and Stephen D. Krasner. 2003. “Germany and Japan: Binding versus Autonomy.” In *The End of Diversity? 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eds. Kozo Yamamura and Wolfgang Streec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ass, Richard N.. 1999.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78 (5): 37-49.
- Hachigian, Nina, Winny Chen and Christopher Beddor. 2009. “China’s New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09/11/pdf/chinas_new_engagement.pdf (October 20, 2016).
- Haynes, Kyle, William R. Thompson,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2012. “Correspondence: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eril or Prom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4): 189-203.
- Huges, Christopher W. and Akiko Fukushima. 2003.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Toward Bilateralism Plus?” In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eds.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ques, Martin.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167-214.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8.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4): 7-48.
- Kahn, Herman. 1960. *On Thermonuclear War*.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3): 242-254.
- Kingdom, John. 1999. *America the Unusual*. New York: St. Martin's.
- Landler, Mark. 2017. "A Breezy Resort, and a Thorny Agenda, for Trump's Meeting with Xi Jinping of 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14/world/asia/xi-jinping-trump-mar-a-lago.html?_r=0 (March 17, 2017).
- Lepgold, Joseph. 1998. "NATO's Post-Cold War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 78-106.
- MacDonald, Paul K. and Joseph M. Parent. 2011.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 (4): 7-44.
- Malone, David and Yuen Foong Khong eds.. 2003. *Un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earsheimer, John.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49.
- Monteiro, Nuno P.. 2011.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9-40.
- Nau, Henry. 2002. "From Bilateralism to Multilateralism." In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d. Henry R. Nau.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FAC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2016. "North Korea Sanctions Program."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Documents/nkorea.pdf> (October 20, 2016).
- Okawara, Nobuo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08. "Japan and Asian-Pacific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Entrenched Bilateralism, and Incipient Multilateralism." In *Rethinking Japanese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2004. "Challenges to Bilateralism: Changing Foes, Capital Flows & Complex Forums." In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eds.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Qin, Yaqing. 2010.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129-153.
- Rathbun, Brian C.. 2012.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Robert S.. 1999.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81-118.
- Ruggie, John Gerald.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3): 561-598.
- Ruggie, John Gerard. 1993.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elling, Thomas C.. 1966.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L. and Xiaoyu Pu. 2011.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1): 41-72.
- Sharife, Khadija. 2009. "China's New Colonialism."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9/25/chinas-new-colonialism/> (April 1, 2016).
- Shih, Chih-yu and Jiwu Yin. 2013. "Between Core National Interest and a Harmonious World: Reconciling Self-role Concep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1): 59-84.
- Shih, Chih-yu. 2014. "Relations and Balances: Self-Restraint and Democratic Governability under Confucianism." *Pacific Focus* 29 (3): 51-73.
- Skidmore, David. 2005. "Understanding the Unilateralist Turn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 207-228.
- Strange, Susan.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Dinah. 2014. "Trends in U.S. Military Spending." <http://www.cfr.org/defense-budget/trends-us-military-spending/p28855> (October 20, 2016).
- Wang, Hung-jen. 2013.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 Wang, Hung-jen. 2015. "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 (3): 172-189.
- Yarbrough, Beth V. and Robert M. Yarbrough. 1986. "Reciprocity, Bilateralism, and Economic 'Hostages':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7-21.
- Zhao, Suisheng. 2013.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2): 535-553.